

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複雜性理論詮釋

陳夢琨*、張世賢**

摘要

顏崑陽認為：中國文學史中，其「原生性」文學本質觀與文學史觀，可經由創造性詮釋而重構為系統性的中國文學史理論。他在 2024 年揭明「詩言志」、「詩緣情」、「文以明道」、與「獨抒性靈」等傳統的中國原生性文學本質觀，並發展其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的四種文學史觀。本文以文獻研究法，從複雜性理論的觀點，詮釋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發現複雜性理論的湧現符合其代變的觀點。

關鍵詞：中國文學發展史、湧現、複雜性理論、源流、代變

壹、前言

一、問題引出

晚清光緒三十年左右，林傳甲撰述第一本章節體《中國文學史》；至今百年間，國內外已生產一千多種相關著作。其中，通史就有四百多種（顏崑陽，2024，頁 32）。顏崑陽（2024，頁 52、58）指出：諸多著作，有的缺乏文學史觀，只是文獻鋪陳（顏崑陽，2024，頁 58）；有的謬用「文學進化史觀」（顏崑陽，2024，頁 58）；有的被迫使用馬克斯唯物論的文學史觀（顏崑陽，2024，頁 34、54）。進化史觀與唯物史觀都是外來的史觀，硬套入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文學發展歷史，幾無詮釋效用（顏崑陽，2024，頁 34、54）。

顏崑陽（2024，頁 61）認為：中國文學史中，本就內含「原生性」文學本質觀與文學史觀，可經由創造性詮釋而重構為系統性的中國文學史理論。他在 2024 年出版《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廣蒐深究龐雜的史料，揭明「詩言志」（頁 99-133）、「詩緣情」（頁 134-163）、「文以明道」（頁 170-245）、與「獨抒性靈」（頁 246-268）等傳統的中國原生性文學本質觀；以及「源流」（頁 269-372）、「正變」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法學博士。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稿：2025/09/01。 同意刊登：2025/11/10。

(頁 373-424)、「通變」(頁 425-514)、「代變」(頁 515-593)四種文學史觀；經過精密的文本分析詮釋與現代話語轉換，重構系統性的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可資應用到「中國文學史」這門學科。本文認為複雜性理論可有更為周全的詮釋。

二、名詞界定

1.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以中國傳統思想「文以載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學體裁，詩、詞、賦、散文和小說等表現。

2. 文學體裁

文學體裁是指文學作品的分類範疇；根據作品的結構、性質、內容和風格等標準，劃分的類別；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和戲劇。另有類別：詩、詞、賦、駢文、散文、小說和戲劇。

3. 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即文體演變史，由文學創作、閱讀及評論實踐、文體知識、文學史觀所構成 (顏崑陽，2024，頁 36)，其中發展流程是創、因、變(顏崑陽，2024，頁 35)，含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四種 (顏崑陽，2024，頁 79)。

4. 複雜性理論

依據 Morçöl(2012)所著《複雜性理論》歸納，每個社會都是複雜性的，有四個要點：1. 系統性(systemness)，2.湧現(emergence)，3. 自我組織 (self organization)，4. 系統動力(system dynamics) (Morçöl, 2012, p. 9)。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演進中，本文以湧現詮釋。社會的複雜性是由社會的各個小系統相互激盪，而形成整體的社會狀況(大系統)。小系統是屬於微觀(micro level)的社會現象，而整體的社會狀況是屬於宏觀(macro level)的社會現象。整體的複雜社會現象是由各個小系統的互動，以新的狀況湧現出來 (Morçöl, 2012: 89)，一直演化、發展、推展。

貳、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一、文獻探討

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文獻，已有多人彙集整理(龔鵬程，2024，頁 7-27)，例

如：陳玉堂(1996)、黃文吉 (1986) 等等。最近，又有顏崑陽 (2024，頁 40-88) 彙集梳理。他認為：「中國文學史」或（一）缺乏史觀的《中國文學史》書寫 (2024，頁 44-45)、或（二）「文學進化史觀」滲透性的泛影響書寫(2024，頁 51)、或（三）《中國文學史》浮濫的集體生產與教條化的「唯物史觀」的史觀 (2024，頁 54)。而中國古代有沒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他要有系統的加以重構 (2024，頁 61-62)。「原生性文學史觀」，主要就是只屬於真正原來就是中國文學的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四種 (2024，頁 79、372)。

顏崑陽詮釋文學史，從文學作品的歷史性著手，文學作品的第一序時間指該文學作品創作的當時，即「始源性」時間；該文學作品的第二序時間係指該文學作品與前文學作品的先後歷程的「因變性」時間 (顏崑陽，2024，頁 69-70)；由此產生文學作品的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四種因變關係的史觀。因變情況從文學作品的體裁、體式表現 (顏崑陽，2024，頁 71-72)。

顏崑陽認為中國文學的原生性本質是「詩言志」與「詩緣情」、「文以明道」與「獨抒性靈」(2024，頁 72)，而史觀則為源流史觀、正變史觀、通變史觀、代變史觀 (2024，頁 79)。說明如下：

1.源流史觀指文學作品怎麼來，怎麼去；「創一因一變」，「**不是線性**往前發展的歷史時序軌跡，而是經由歷史反思，重新定義文學，以文士們『因』而能『變』的『再創造』，往復循環，推動文學歷史綿延不絕的發展。」(顏崑陽，2024，頁 370-371)，符合**複雜性科學的非線性演化**。

2.正變史觀指文學創作，或「因正創變，迭代循環」，或「歸源宗正，因時創變」，以接續、共同參與「有機性文學史」的建構 (顏崑陽，2024，頁 421)。符合**複雜性科學的因時適應，微調創變，「適應」觀點**。

3.通變史觀指文學創作「變化適時，取捨會通」，以達「貫通其變」(顏崑陽，2024，頁 489)，「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顏崑陽，2024，頁 469)的變是大變，因原路已窮，符合**複雜性科學另闢「分歧」之蹊徑，變通創新的觀點**。

4.代變史觀指文學創作隨(1)帝王權力主導、(2)政教治亂、(3)文化思潮、(4)前代文學典範、(5)文人才性情志，而產生代變 (顏崑陽，2024，頁 576)。符合**複雜性科學新局面，全面革新、湧現的觀點**。

這四種史觀，各有著重獨特觀點，源流史觀著重流程，源遠流長，不是固定

發展，是**非線性**演進。正變史觀著重演變係遵循「正」，或「宗正」；一直演變下去。因時微調適應，仍不離其正。通變史觀著重「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歷史發展。講究大變以求通達。至於代變史觀則著重文學作品受到內外因素的**互動**，產生整體的代變。每一代有其不同的文學作品體裁與體式。整體言之，這四種史觀符合複雜性理論的觀點。本文以複雜性理論充實之。

二、理論基礎

本文以複雜性理論充實顏崑陽(2024)中國文學史演化的研究。中國文學界是一個**複雜性系統**，其範圍是由實際的社會狀況所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而成的。內部的複雜性(complexity)，是指成員的多元性、變遷、不確定性，並且交錯互動牽連糾葛在一起 (Haynes, 2015, pp.24-50)。複雜性可以從數學的非線性關係 (nonlinear relationship) 表現出來(Morçöl, 2012)。

線性是指一個因必然產生一個固定的果。而**非線性**表達複雜性情形，在自然界以及在人文社會往往是一個因可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果；是不確定，不可預測、變化等等特性。複雜系統內部互動為什麼會形成文學？因為複雜性理論的複雜系統著重系統內的社會連結，及其人際關係互動的整體性，所形成的系統，其內部有許多人際關係網絡 (Considine, et. al.,2009:51)。社會不只是個人之聚集，而是溝通之聚集(Considine, et. al.,2009:52)。創新來自網絡之溝通，人們鑲嵌在網絡裡，因網絡的連結，傳遞資訊，組合資訊，使得文學創作更容易 (Considine, et. al.,2009, p.55)。網絡內的腦力激盪激發了文學創新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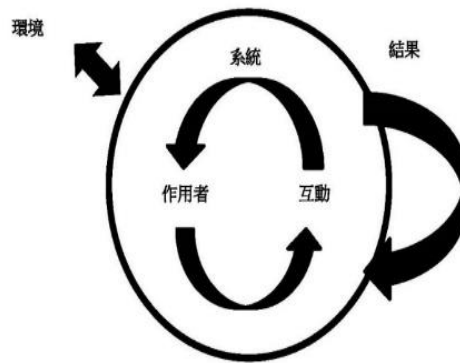
複雜性系統最基本的構成分子是具有適應能力、作用力、主動的個體，稱「**作用者**」(agents)，在文學界稱文學家，或作家，或詩人。「作用者」與其他作用者在其**環境**內，**互動**，又受到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又根據其互動效果，修改自己的行為，以便更好地在客觀環境中生存。由此，系統在作用者之互動以及作用者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發展，表現出整體系統的**演化**、**突現**(emerge)過程 (MBA 智庫百科, 2016)。

文學家在無窮無盡的相互作用中，會產生自發性的**自組織** (self-organization)。因為生命遇到困難，會自動去找出路。「作用者」會想要突破困局，不願意坐以待斃，便自動組織起來，解決問題，不至讓問題惡化。文學家會組成社團，如詩社，相互切磋，使文學進步。

整體複雜性系統受到互動發展的進行過程，有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即有四種**結果**：1.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指系統發展仍依賴原有狀況，因襲、承襲；有如蕭規曹隨、依樣畫葫蘆。2.狹義的演化(evolution)，指系統發展與以前比較，已有稍微不同，逐漸、漸進在改變。3.分岐(bifurcation)，指系統發展已與原系統明顯不同，已改變。窮則變，變則通；分岐，表示已與原系統分道揚鑣。4.突現(emergence)，指系統發展已與原系統完全不同；例如詩詞變成小說(Rhodes et al., 2011, p.202)。本研究貫穿五千年，只研究其結果為湧現者。複雜性系統模式，包括：環境、系統、作用者、互動、結果。見圖 1。

圖 1

複雜性系統模式



資料來源：Public Management and Complexity Theory: Richer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Services (p.9), by M. L. Rhodes, J. Murphy, J. Muir, & J. Murray, 2011. Routledge.

叁、研究方法：複雜性科學研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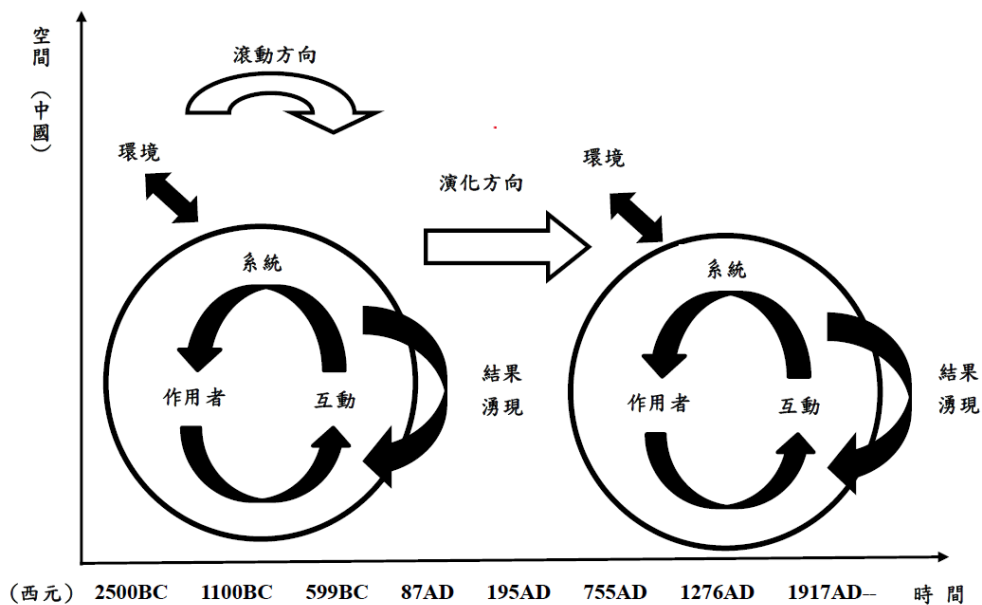
一、研究架構的建立

中國文學界是複雜性系統，存在特定時間、空間裡。受**環境**影響。以**作用者**(文學家)為文學發展的重心，文學家有其才性情志，以作用者(文學家)創作的文學為研究對象。外在環境為(1)帝王權力、(2)政教治亂；內在環境為(3)文化思潮、(4)前代文學典範；這是從顏崑陽 (2024, 頁 568-576)研究中國文學史「代變」史觀所得到。本文之研究不細分內外環境，以環境分析之。

文學作品有其體裁；作用者**互動**的結果，文學作品的體裁，可能維持原狀，稱路徑依賴，簡稱依賴。可能適應新環境，演進，漸進微調，簡稱適應。也可能脫離原來的路徑，已分道揚鑣，簡稱分歧。也可能本質已完全不同，稱湧現 (Rhodes et al., 2011, p.202)。一直互動發展下去，有創，有因，有變；也即有源，有流，如同顏崑陽所稱「源流史觀」(2024，頁 259-372)。文學發展的變化，可以分解為：創作主體、作品思想、文學體裁、文學語言、藝術表現、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文學傳媒、接受對象等的變化。在五千年歷史的演化過程中，本文只取其牢牢大者，突顯的演化，即**湧現**，進行探討。

由左邊的社會，湧現其結果，再演化，湧現新的結果，形成右邊的社會；一直演化、湧現下去。

圖 2
本文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資料蒐集

本論文文獻蒐集，從探討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著作：顏崑陽 (2024)《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著手，探尋、追蹤、蒐集其所引用的文獻。並仔細查

驗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過程，與複雜性科學演化的觀點所需要的資料，完全一致。

三、資料分析

1. 環境分析

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與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息息相關，無論是政治制度、思想學術、經濟模式還是文化交流，都深刻影響了文學的主題內容、體裁形式和風格特色。環境的改變對中國文學史發展的影響是顏崑陽 (2024) 所未探討的。

2. 系統分析

中國文學界本身也是系統，系統內的成員互動，逐漸演化、發展，不只是居於某特定空間，而且延伸至某特定時間範圍，具有別於上下時期的特性、完整性，自成為一個時空系統。由此思路進行分析，即以作用者的互動過程為研究重心，以整體系統的發展狀況分期。系統範圍由實際的社會建構過程(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所構成。內部有其系統性與整合性(Morçöl, 2012, p. 61)。中國文學發展史各時期的時空系統也是顏崑陽 (2024) 所未探討的。

3. 作用者分析

系統組成的元素，是「作用者」(agents)，非常繁多 (van Buuren, et. al., 2009, p.168)，這些作用者的身分在不同情況下，可能是重疊的。無論他們是什麼身分，作用體由於相互影響，基於利害關係，而逐漸不斷地自我組織或重組成較大的組織結構。有如生物體，分子會形成細胞；神經元會形成頭腦；物種會形成生態體系；消費者和企業會形成經濟體；設施及活動會形成都市，而這些新產生的整體結構都會形成不同層次的行為模式 (賴世剛，2006，頁 7；陳夢琨，2019，2020，2021)。

4. 互動結果分析

系統由許許多多的作用者組合而成，作用者的行為不但受到其他個體的影響，其本身也會影響其他作用者的行為，最後系統的整體型態是受到作用者間不斷互動所達成的結果(Chapman, 2016, p.9)。以作用者的互動成果 (文學作品) 為分析對象，例如：經典著作有詩經、樂府、唐詩、宋詞、元曲以及先秦諸子散文等，「四大才子書」(清代金聖歎所定) 如：《莊子》、《離騷》、《史記》、杜甫律詩、《水滸傳》、《西廂記》等，著名的文學著作眾多，以「四大名著」(《紅

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最為廣為人知等等。

5. 中國文學發展史分期

中國文學發展，自約自 2500 BC，中國文學界開始互動，導致中國文學界演化發展，嘗試分為 8 個時期。劃分時期，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標準。不應強求一致，應可言之成理。

第一時期：2500 BC – 1100 BC，從有記載之遠古，至詩經開始發表。

第二時期：1100 BC—599 BC，從詩經開始發表至結束。

第三時期：599 BC—87 AD，從詩經結束發表至東漢樂府詩興起。

第四時期：87 AD—195 AD，從東漢樂府詩興起至東漢建安文學興起。

第五時期：195 AD—755 AD，從東漢建安文學興起至唐.安史之亂爆發。

第六時期：755 AD—1276 AD，從唐.安史之亂爆發至南宋滅亡。

第七時期：1276 AD—1917 AD，從南宋滅亡至民國白話文運動。

第八時期：1917 AD---今，從民國白話文運動至今。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第一時期：2500 BC – 1100 BC

1. 環境

本時期約略從已有記載之上古時代 (2500 BC)，至詩經開始發表(1100 BC)；這是顏崑陽 (2024)所未探討的，顏崑陽從詩經探討起。中國的上古時代，或稱為傳說時代或遠古時代，已有甲骨文、金文記錄。許多事件和人物帶有神話色彩。

2. 系統

在此一時期之系統，是初民社會，即上古時代很大程度係由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構成。這些故事後來被記錄在《山海經》、《尚書》等古籍中。傳說中的人物包括盤古、伏羲、女媧等創世神，以及炎帝、黃帝、堯、舜等部落首領。

3.作用者

如后羿射日和打獵有關，女媧造人與製陶有關，把人民的生活情景滲入故事裡，加以浪漫化。作用者 [主角] 性格鮮明，能力不平凡。作用者 [主角]是原始社會裡的英雄人物，或對超自然力或敵對的人類集團加以藝術誇張而成。

4.互動

遠古時代，人類的活動以狩獵、祭祀、歌謠、舞蹈、音樂為主；遠古中國文學起源於口耳相傳的神話傳說和歌謠、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其主要用於占卜、祭祀和政事記錄，尚未發展為成熟的文學 (鄭振鐸，1991；董乃斌、錢理群，2004，頁 1-15)。

5.結果

中國最早的文學雛型是口頭流傳的原始神話和歌謠，其中歌謠常與祭祀等儀式活動結合，以及出土的甲骨文與金文記載 (鄭振鐸，1991；董乃斌、錢理群，2004，頁 1-15)。文學內容想像力強，題材廣泛；是奇特想像和幻想所創作，具有神奇、豐富、多樣化的特色。表面荒誕，實質樸素、真實、生動。故事性強，情節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本時期最後湧現詩經時期。

二、第二時期：1100 BC—599 BC

1.環境

《詩經》的年代，約在 1100 BC—599 BC，西周初年至東周。周定王 8 年，涵蓋時間約五百多年。從 1100 BC，《詩經》中的一些詩篇出現的時候起，中國文學長河的輪廓已經明朗起來，後來逐漸匯納支流，演化得越來越寬廣。這是顏崑陽 (2024)所探討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的源頭，也是本質：「詩言志」(頁 99-133)、「詩緣情」(頁 134-163)、「文以明道」(頁 170-245)、與「獨抒性靈」(頁 246-268)；由此開展他的「源流」史觀 (頁 269-372)。

2.系統

上古巫史不分，史從巫中分化出來，《尚書》是記載政治與戰爭的公文書，這是一大進步。而士的興起與活躍，對文學的發展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先秦文學的形態，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詩樂舞結合，《詩經》裡的詩歌大都是群體的歌唱。這種混沌的狀態成為先秦的一大景觀 (董乃斌、錢理群，

2004，頁 16-21)。

3.作用者

《詩經》分為三個主要部分：「風、雅、頌」。風是民歌和地方歌謠。雅分為《大雅》和《小雅》，為周朝廷的樂歌，包括官員和貴族的作品。內容主要涉及宮廷宴會、諸侯朝會、歷史敘事、政治諷諫、貴族生活以及個人的情感抒發等。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是宮廷和宗廟祭祀時使用的樂歌，用於頌揚祖先功德、讚美君王，通常伴隨舞蹈表演。《尚書》的歷史價值在「上古及夏、商、周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記載先秦政治和歷史的重要文獻，其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結構、權力運作和社會觀念。其主要功能與政治緊密結合，記錄、宣揚或傳達官方的政令、君臣的言論而創作。

4.互動

在此時期，「詩言志」、「法自然」、「思無邪」、「溫柔敦厚」表現作用者之間的互動方式。從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來看，士大夫作為創作的主體和接受對象，文字作為傳播的主要媒介。中國文學的這個基本格局也是在此時期奠定。直到宋代出現了市民文學，才使互動方式發生了變化。

5.結果

詩經年代 (1100 BC—599 BC) 在中國文學的意義，主要體現在為先秦文學奠定了基礎(董乃斌、錢理群，2004，頁 16-21)，當時的文學創作主要以歷史記錄、政治宣示和民間歌謠為主，如《尚書》和《詩經》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這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多元化和豐富性，文學不僅是藝術創作，更是記錄歷史、表達情感、規範行為的重要載體 (董乃斌、錢理群，2004，頁 16-21)。本文同意顏崑陽 (2024)認為詩經揭明「詩言志」(頁 99-133)、「詩緣情」(頁 134-163)、「文以明道」(頁 170-245)、與「獨抒性靈」(頁 246-268)是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的源頭與本質。本時期結束，湧現出下一個時期。

三、第三時期：599 BC—87 AD

1.環境

從 599 BC (東周.周定王 8 年，詩經年代結束)，歷經秦朝統一文字，漢代確

立儒家思想為官方學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形成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經學思維，至 87 AD (東漢.漢章帝章和元年，漢樂府詩興起)。

2.系統

此時期秦漢帝國強大與統一，漢賦興盛，文辭古奧、典故繁多，多用於宮廷慶典，以頌揚，與帝國政治相適應。本文認為秦漢的文學是詩經在大一統時期的代變，也就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3.作用者

秦漢文學不同於先秦文學。因文學創作者的處境不同，他們聚集在王侯或帝王周圍，形成幾個作家群，以歌功頌德或諷喻、譏諫為己任。如漢朝.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東方朔，與漢代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相適應。漢代文學以大為美，鋪張揚厲成為風尚。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相適應。

4.互動

文學創作者聚集在王侯或帝王周圍，或大都會，以歌功頌德或諷喻、譏諫為己任。

5.結果

漢代文學以大為美，漢代文學失去了詩經時期的生動活潑與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凝重板滯的風格。然而，對於中國詩歌來說，漢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朝代。《詩經》那種四言的軀殼到漢代已經僵化了，楚辭的形式轉化為賦；漢代樂府民歌卻以一種新的姿態、新的活力，卻從民間興起，繼而在文人中，顯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並由此醞釀出中國詩歌的新節奏、新形式。這就是歷久不衰的五七言體。本時期結束，湧現出下一個時期，漢樂府詩時期。

四、第四時期：87 AD—195 AD

1.環境

從 87 AD (東漢.漢章帝章和元年，漢樂府詩興起)至 195 AD (東漢.漢獻帝興平 2 年，建安文學興起)。漢末戰亂、政權更迭頻繁，社會秩序崩潰，傳統儒家價值觀受到衝擊。環境大變，其文學內涵也跟著大變。符合顏崑陽 (2024)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2.系統

本時期之系統，在東漢，士族階層形成，佛、道思想盛行，文人開始關注個體生命和內心世界。漢末動亂與氣候變遷引發文人對生命短暫的焦慮感，促使他們追求精神上的寄託，影響了後來的文學主題。

3.作用者

東漢時期文學發展趨勢，特別是漢樂府詩集的大量整理和文學理論的初步形成。是東漢中後期文學逐漸發展和成熟的歷史節點，為後世奠定了重要基礎，尤其在詩歌和散文方面。

4.互動

文人的互動，東漢樂府詩逐漸形成，展現民間文學的巨大生命力，為後世詩歌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範本。文學創作不斷豐富。尤其在經學和史學的基礎上，開始出現新的散文風貌。散文的風格更加多樣化，從早期簡樸的散文到後期更加華麗的文章，文學體裁不斷豐富。

5.結果

文學理論的萌芽，雖然尚未形成嚴格的理論體系，但此時期已出現關於文學的討論，為後世文學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例如，對詩歌和散文的討論已在文人中逐漸興起，展現文學創作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本時期結束，湧現出下一個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的文學繽紛時期。

五、第五時期：195 AD—755 AD

1.環境

從 195 AD（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文學興起），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大一統，至 755 AD (唐玄宗，安史之亂)；其中，隋唐代結束長期戰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交流頻繁（包括中西交流和佛教發展），科舉制度進一步完善，士人入仕機會增加。環境大變，其文學內涵也跟著大變，符合顏崑陽(2024)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2.系統

本時期歷經 195 AD（東漢末年），漢獻帝建安文學興起，魏晉、南北朝、

隋唐大一統，至 755 AD (唐玄宗，安祿山造反)，計 550 年，其中有魏晉、南北朝離亂、隋唐大一統，卻成一完整系統；因宗教上，有玄學和佛學滲入文學，使文學呈現多姿多彩的完整而繽紛的新面貌。

3. 作用者

這時期的文學創作，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若干文學集團。文學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學的技巧。例如，以曹操為首的鄴下文人集團在發展五言古詩方面的作用，齊梁和初唐的宮廷詩人在建立近體詩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證據。

文學自覺，意識提高，文人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玄言詩、山水詩興起，陶淵明等的田園詩表現了對自然和個人隱逸生活的嚮往，反映了文人對現實政治的逃避和精神的追求。安史之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繁盛。李白詩歌中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熱愛美好事物，敢於輕蔑不合理現象。這股反抗精神成為後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的強大精神力量。

4. 互動

魏晉南北朝文學風格的轉變，從漢代注重經學與倫理的文學風格轉變為更為自由、個人化的風格。文學作品開始強調個人情感和審美趣味。文學理論的萌芽。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氣為主」，這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文學從「經學的附庸」逐漸獨立，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此時期文學創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出現了许多傑出的文學家，也產出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陳壽的《三國志》是此時期的代表作，不僅是史書，也具有文學價值。在儒家提倡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之外，玄學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為作家的美學追求；佛教關於真與空的觀念、關於心形的觀念、關於境界的觀念，也促進了文學觀念的多樣化。唐詩達到巔峰，風格多樣，題材廣泛。盛唐詩歌氣象萬千，充滿自信和進取精神（如李白、杜甫），反映了國家的繁榮強盛。

5. 結果

中國文學體現在文學創作風格的轉變和文學觀念的發展，標誌著從漢代嚴謹的經學文學向魏晉時期更加自由、個人化的文學過渡，文學作品開始強調個人情感與審美趣味，文學從「經學的附庸」逐漸獨立。《三國志》的創作前奏以

及文學理論的萌芽，對後世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這是五七言古體詩繁榮發展並達到鼎盛的階段，也是五七言近體詩興起、定型並達到鼎盛的階段。詩，占據著文壇的主導地位。文向詩靠攏，出現了詩化的駢文；賦向詩靠攏，出現了駢賦。從「三曹」「七子」，經過陶淵明、謝靈運、庾信、「四傑」、陳子昂，到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詩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這個階段最後一位詩人，又是開啓下一階段的最早的一位詩人，像一個里程碑矗立在文學史上。「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這兩個詩歌的典範，先後在這時期的頭尾確立起來，作為一種優秀的傳統，成為後代詩人追慕的極致。這又是一個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的階段，作家獨特的人格與風格得以充分展現。陶淵明、李白、杜甫，他們的成就都帶著鮮明的個性。本時期結束，湧現出一個時期，文學現實主義時期。

六、第六時期：755 AD—1276 AD

1.環境

從 755 AD (唐中葉「安史之亂」爆發)至 1276 AD (南宋滅亡)，755 AD 的安史之亂是秦統一以來，中國最大的歷史巨變，摧毀了三千年關洛（長安、洛陽）古典文明，破壞了華北的生態環境。唐朝由盛轉衰，表現文學從盛唐時期的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並為後世文學的發展奠定基礎。宋代實行「重文輕武」國策，大開科舉，形成「文人政治」格局。商品經濟發達，城市繁榮，市民階層興起，儒學復興形成理學。宋詞成為主流文學體裁；初期，詞風較婉約，後隨社會環境變化出現蘇軾等豪放派，反映了士人複雜的政治抱負和人生感懷。

2.系統

本時期從中唐安史之亂，至南宋滅亡；安史之亂後的社會動盪，詩歌內容轉為**現實**批判、邊塞苦寒或個人的孤寂情懷，風格更趨深沉含蓄。隨著宋朝城市發展，話本小說等通俗文學開始萌芽並逐漸發展，為後代小說戲曲繁榮奠基。

3.作用者

安史之亂後，詩人開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寫，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人文意象明顯增多，到了宋代已成為普遍的風氣。杜甫、白居易開創反映民生疾苦、積

極關心政治良窳，以及深沉的憂患意識，在晚唐一度減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強。以杜甫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風格**逐漸興起，展現了積極入世的現實主義精神，為後世**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宋朝蘇軾、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亦然。

4.互動

安史之亂後的文學作品，例如杜甫的詩歌，都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疾苦。宋代詩人與學者身份合一，議論成分增加，以及化俗為雅的美學追求。

5.結果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標誌，同樣也是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符合唐中葉以後，文學體制發生變化，韓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學語言和文體的改革，宋代的歐陽修等人繼續完成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實現的改革，確定此後的文學語言和文體模式，一直到民國八年「五四」才打破。唐中葉以後曲子詞迅速興盛起來，經過五代詞人溫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蔚為大觀，並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並且傳奇的興盛，表示中國小說進入成熟的階段。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說」的興起，宋代「說話」的興盛，是新發展。這時期的發展符合顏崑陽 (2024)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七、第七時期：1276 AD—1917 AD

1.環境

本時期，自 1276 AD 宋朝滅亡，至 1917 AD，民國白話文運動。元朝，蒙古人極權統治，文人無社會地位。明清時期專制集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資本主義萌芽，市民文化更加繁榮。

2.系統

這時期的文學系統，在元、明、清的極權專制統治下，文人沒有社會地位，無從在傳統的文體發表新作品，而往通俗的文體發揮。其中又以小說最具生命力。這些通俗文學借助於日益廉價的印刷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並產生廣泛的影響。

3.作用者

元代敘事文學占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從此，文學的對象更多地從案頭的讀者轉向勾欄瓦舍裡的聽眾和觀眾。文學的傳媒不僅是寫在紙上或刻印在紙上的讀物，還包括了說唱扮演的藝術形式。儒生社會地位降低，走向社會下層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先是適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繼而提高這些文學形式，於是出現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統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學以戲曲和散曲為代表，以大都為中心的雜劇與以溫州為中心的南戲，共同創造了元代文學的輝煌，元末明初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兩部長篇白話小說，成為這一階段的另一標志，它們的出現預示著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到來了。明代流行的傳奇又是對元曲的繼承與發展。清代鴉片戰爭帶來千古未有之變局，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文化開始湧入中國，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在向西方尋求新的富國強兵之路的同時，也尋求到新的文學靈感，成為一代新的作家。

4.互動

元朝的文人互動，轉入社會的中下階層。而明嘉靖以後，隨著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壯大、印刷術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學創作的商品化成為新的趨勢，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學占據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現就是這種現象的綜合反映。創作主體的個性高揚，作品以更加強烈的色彩表現出來，對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對理學禁欲主義進行強烈的衝擊。湯顯祖的《牡丹亭》所寫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愛情，便是一種新的呼聲。

明清易代是中國文學史巨大的變化。清詩、清詞仍有不可忽視的成就；而戲曲、小說成就更大。湯顯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共同達到傳奇的頂峰。白話長篇小說的豐收期，吳承恩的《西游記》、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是這時期的巔峰之作。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中國文言小說的高峰。

5.結果

明代中葉的確是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端。小說（章回體長篇小說）和戲曲獲得極大發展，成為文壇重心。《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作品深刻反映了封建

社會的衰落和人性的複雜。清代鴉片戰爭促使中國文人尋求新的文學靈感，成為一代新的作家；例如，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便是這批新人的代表。與社會的變化相適應，文學創作也發生了變化。救亡圖存的意識和求新求變，成為文學的基調。文學著作成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小說的地位獲得充分的肯定。外國翻譯作品逐漸增多，文學的敘事技巧更新。報刊新媒體出現，一批新的報人兼具有作家的身分，以報刊傳播其作品，寫作方法也因適應報刊的需要而有所變化。在古文的領域內出現通俗化的報刊文體。這時期的**大變**發展，符合顏崑陽 (2024)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八、第八時期：1917 AD--迄今

1.環境

西學東漸，文化轉型，西方列強入侵，國門被迫打開；傳統文化受到巨大衝擊。**1917**年是中國「文學革命」的關鍵轉折點，標誌著以白話文取代言言文的「文學」論述，正式進入大眾視野，並由胡適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等文章倡導文學的革新。

2.系統

此時期的系統更為開放，新文學運動興起，白話文取代言言文成為主要書寫形式。魯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直接批判社會現實，反映民族危機和人民的苦難，具有強烈的啟蒙和救亡意識。文學呈現出學習西方文學的趨勢，英美現代主義等思潮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

3.作用者

1917年，胡適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正式提出以白話取代言言文的主張，認為「死文字」無法產生「活文學」，並倡導「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胡適的觀點為新文學提供了理論依據，主張用口語創作，為後來的「五四運動」中的文學革新奠定了基礎，對後來的中國文學產生深遠影響。

4.互動

胡適的白話文主張立即引發守舊派文人的強烈反對，如林紓等認為使用口語寫作會降低文學的格調。這場新舊論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篇章。**1917**年之後，白話文的應用逐漸成為趨勢，胡適也於**1919**年寫出第一個白話獨幕劇

《終身大事》。白話詩集《嘗試集》於 1920 年出版。

5.結果

1919 年五四運動爆發，作為一次新文化運動，不僅在社會史上開啓一個新的風濤，也在文學史上開啓了一個新的發展。這時期的大變發展，符合顏崑陽 (2024) 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在五四運動之前，雖然出現新思想與新風格的作家，但仍屬於古典文學的範疇。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作家，才有質的變化。五四闖上了中國數千年古典文學的門，同時打開了文學的一片嶄新天地。這時開始了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語言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由古奧轉向淺近。文學傳媒出現了印刷出版、講唱、舞臺表演等各種新的形式。總之，中國文學所有的各種因素都在這個時期具備而且更為成熟。

伍、結論

顏崑陽在 2024 年出版《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廣蒐深究龐雜的史料，揭明中國原生性文學本質觀是「詩言志」(頁 99-133)、「詩緣情」(頁 134-163)、「文以明道」(頁 170-245)、與「獨抒性靈」(頁 246-268)等，並以此為中華文化的特性，是為「正」，為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源流」(頁 269-372)，一脈相傳；隨環境變化，「正變」(頁 373-424)，雖變，仍維持中華文化正統；五千年來中國文學的發展演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維繫中國文化的命脈，即「通變」(頁 425-514)；而從明顯各時期大變的時段言，「**代變**」(頁 515-593)符合複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本文發現：中國文學發展的變化，不論：創作主體、作品思想內容、文學體裁、文學語言、藝術表現、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文學傳媒、接受對象等的變化，在五千年歷史的演化過程中，仍秉持「詩言志」、「詩緣情」、「文以明道」、與「獨抒性靈」等本質為源流，一脈相傳。隨環境變化，「正變」、「通變」、「代變」。而**代變**，即是複雜性科學的**湧現**。各種文學體裁體式的變，都是「創一因一變」可以溯源，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詩歌可以追溯到《詩經》《楚辭》和漢樂府，小說可以追溯到神話傳說，《左傳》《史記》等歷史散文，以及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辭賦可以追溯到《楚辭》，駢文中對偶的修辭手法...等等。每一時期的大變發展，符合顏崑陽 (2024) 所稱的**代變**，也就是複

雜性科學所認定的湧現。

參考文獻

張世賢 (2017)。政策創新複雜性理論探討。科際整合月刊，2(10)，21-33。

陳玉堂 (1986)。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黃山書社。

陳夢琨 (2019)。市區發展的回顧與前瞻—以台北社子島發展為例〔論文發表〕。「治國良規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團法人華夏科技整合聯合總會，6月23日，台北。

陳夢琨 (2020)。臺北市社子島開發案探討：複雜性理論作用者的觀點。思與言，58(2)，105-166。

陳夢琨 (2021)。台北市社子島開發案探討：複雜適應系統探討〔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台北大學。

黃文吉 (1996)。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萬卷樓圖書。

賴世剛 (2006)。都市、複雜與規劃理解並改善都市發展。詹氏書局。

鄭振鐸 (1991)。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莊嚴出版社。

董乃斌、錢理群 (2004)。中國文學史。貴州人民出版社。

顏崑陽 (2011)。中國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初論，政大中文學報，(15)，231-272。

顏崑陽 (2021)。中國古代原生性「正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政大中文學報，(35)，49-110。

顏崑陽 (2024)。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聯經。

龔鵬程 (2024)。中國文學史的外國性與政治性。載於 顏崑陽，中國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 (頁 7-27)。聯經。

- Chapman, K. (2016). *Complexity and Creative Capacity*. Routledge.
- Morçöl, G. (2012). *A Complexity Theory for Public Policy*. Routledge.
- Rhodes, M. L., Murphy, J., Muir, J., & John Murray, J. (2011). *Public Management and Complexity Theory: Richer Decision-Making in Public Services*. Routledge.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eng-kwen Chen*, Shih-Hsien Chang**

Abstract

Kun-Yang Yan argues that the "original" view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view of literary history can be reconstructed into a systematic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rough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In 2024, he revealed the traditional views of the original ess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uch as "poetry expresses the will," "poetry originates from emotion," "literature clarifies the Way," and "expressing one's unique spirit," and developed four views of literary history: origin, positive change, transformation, and generational change. This paper uses a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 to interpre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xity theory, finding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plexity theory is consistent with its view of generational chang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Ph. D.,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Professor Emeritus,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September 1, 2025. Accepted: November 10, 2025.